

区域国别学专题

“时间差”“位置差”“权力差”与区域 国别自主知识生产：以拉美研究为例^{*}

王 飞 陆屹洲

内容提要：多极化时代，中国既是区域国别研究的参与者，又是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者。知识生产既受到权力的深刻影响，又反作用于权力的各个方面。知识生产过程将知识生产者的观念转化为知识应用者的观念，进而产生了前者之于后者的知识权力。作为当前最为敏感、最为重要、最为综合的知识群落之一，区域国别知识具有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得失直接关系到国家软权力的成败。从知识、权力和区域国别学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双重面向入手，本文以美国的拉美研究为参照系，聚焦知识生产，分别对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存在的两种“级差”展开分析，最后落到权力维度，讨论以拉美为研究客体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回答我们需要怎样的拉美研究、如何打破拉美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中存在的“权力差”。中国作为国际学术界区域国别研究的后来者和“全球南方”的代表，通过同拉美国家平等、互利的合作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模式，回应“污名化”的知识传播，供给有助于中拉文明交流互鉴的新知识，是中国和拉美国家对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共同期待和价值追求。

关键词：自主知识体系 拉美研究 区域国别学 中国式现代化 文明交流互鉴

作者简介：王飞，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陆屹洲，中国社会评价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D871，D8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649（2025）02-0045-27

^{*} 本文是2024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知识分子引导公共舆论的比较政治心理研究”（编号：24CZZ018）的阶段性成果。

当前，国际社会向多极化发展，但国际社会中的知识和理念却仍深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西方国家为维护其在国际秩序中的优势地位，垄断了学术、学科和话语，并且通过知识生产长期压制“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权和国际话语权。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秩序大调整放大了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存量缺口，知识生产体系转型升级迫在眉睫。被视为“先进”和“普世”的西方知识、西方文明和西方价值，实际上在时间和价值两个维度上形成了对“全球南方”国家知识生产的权力控制。为了打破这种局面，需要一场根本性的变革。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带霸权色彩的西方知识权力结构。^① 随着 2022 年区域国别学独立为一级学科，关于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可以率先垂范。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又是总结后发经济体发展经验教训的实践过程，还是传承与创新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生动体现。

现代意义的区域国别研究源自美国。长期笼罩在美国“门罗主义”之下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简称“拉美”）地区在 21 世纪以来实现了同中国关系的大发展，中拉关系成为当前影响中美关系和美拉关系的重要变量。因此，以美国的拉美研究知识生产为参照，不仅可以服务于新时代中拉关系的塑造，更能以拉美为中心打造“全球南方”知识生产体系。^② 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确立后，面临通过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简称“三大体系”）建设，构建中国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重大使命。建立一门新兴学科需要具备诸多基本要素，国家需要正是决定性因素。李慎之先生在《剑桥拉丁美洲史》中文版序言《加强地区研究，赶上世界学术研究趋势》中指出，中国的区域研究起源于国际问题研究，具有鲜明的本土特征，即实践先于理论，解决问题的迫切性优先于分析问题的重要性。拉美作为中国外交的重要区域，在推动世界多极化、维护多边主义方面同中国有着共同利益，中拉合作基础牢靠，潜力巨大。从特朗普 1.0 到拜登，再到特朗普 2.0，美国两大党视中国为竞争者的战略共识越来越牢固，针对中国及其与第三方合作的限制、打压、破坏等行径

^① 吴海江等著：《中国式现代化与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年，第 2 页。

^② 事实上，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源自近代欧洲殖民扩张。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关于拉美知识的生产及其传播是无法忽略的，但早期欧洲殖民者对西半球专门性区域知识的开发服务于其拓殖进程，并未严格区分北美洲和南美洲，这种整体性将美国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合并，为欧洲国家提供了殖民扩张的理论支持和策略指导。参见柴彬、陈谦悦：《近代欧洲殖民扩张与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载《学术研究》，2023 年第 12 期，第 129 - 136 页。

影响了正常的国际秩序。中国需要发展服务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通过同世界其他地区和国家的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夯实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外部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①，这体现了时间和位置两个层面的自主知识体系构建面向。近年来，有大量研究围绕区域国别学展开，但从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特别是知识权力角度的解读仍存在不足。本文从知识权力和区域国别学基础理论与应用对策这两类知识的关系入手，抽象出拉美知识存量与增量生产维度的“时间差”和拉美知识供给目标导向的“位置差”两条路径，揭示西方国家在拉美知识生产层面的知识权力，进而基于“权力差”探寻如何优化中国的拉美区域国别知识生产。需要指出的是，本文虽然主要以美国的拉美研究作为参照，但并不去深究美国拉美研究的建立和发展过程。

一 研究述评

中国已经发展成为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刮目相看的经济体，但无论是来自发达国家的“俯视”还是发展中国家的“仰视”，两种目光依然秉持“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体系和思想观念来“观照”中国，使学术知识生产面临“窘境”。^②这种现实要求中国必须加快构建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通过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构建，形成全球范围内话语体系的影响力。与本文主题相关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知识生产与自主知识体系、区域国别知识生产及其范式两类文献。前者是在知识体系构建层面对知识生产自主性的思考，后者则是针对区域国别学或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及其范式的探讨。当然，拉美研究是本文的落脚点，也是两类文献均涉及的对象区域。

（一）知识生产与自主知识体系

知识与权力密切相关。^③21世纪以来，虽然“全球南方”的知识生产表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8页。

^② 魏长宝：《从讲好中国故事到提炼中国理论——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学术期刊使命》，载《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年第1期，第133-138页。

^③ [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第203页。

现出了明显的体量突破和提质增效，但西方知识霸权仍然广泛存在。^① 相比自然科学领域，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知识霸权涉及战略意图，因此更须引起警惕。^② 一般认为，西方知识霸权，特别是社会科学知识霸权，主要通过七种途径作用于全球南方：知识本身、知识媒介、先进技术、研究资助、教育投资、人才流动和知识评价。^③ 这七种途径实际上贯穿了知识生产的全过程。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形成的背景是 1978 年的改革开放，在吸纳西方的资金、技术、管理经验的同时，西方的思想体系也随之舶来。作为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内最为“形而上”的世界政治学科和世界经济学学科，基本上是按照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理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如阶级论、帝国主义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如劳动价值论、资本积累论）被边缘化，国际关系的“三大范式”和世界经济的“新古典经济学”充斥其中。这些理论均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利益，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按照这种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研究中国并获取对域外国家或地区的认知，事实上沿袭了“西方中心主义”并不断强化了西方学术话语权。^④ 面对殖民主义的立场存在三种不同的知识传统：一是原殖民主义者的知识传统，二是殖民秩序“顺应者”的知识传统，三是殖民秩序“反抗者”的知识传统。^⑤ 历史上，中国曾经有过希望作为“顺应者”参与殖民秩序的尝试，但因日本的强烈反对而放弃。^⑥ 这就是一种“时间差”，日本先行作为“顺应者”参与殖民秩序并塑造了东亚的地区秩序，限制了中国的能动空间。

① Jinba Tenzin and Chengpang Lee, “Are We Still Dependent? Academic Dependency Theory after 20 Years”, i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Vol. 35, No. 1, 2022, pp. 2–13.

② 李启咏：《学术殖民、知识霸权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构建》，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4 年第 4 期，第 104–112 页；“Editorial: Legacies and Futures for Global South Research”, in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45, No. 1, 2024, p. 1.

③ Syed Hussein Alatas, “Academic Dependency and the Global Division of Labor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Current Sociology*, Vol. 51, No. 6, 2003, pp. 599–613.

④ 相关研究可参见孙震海：《国际问题写作要避免落入西方话语陷阱》，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 年 3 月 12 日第 6 版；Peter A. Jackson, “Mapping Post-structuralism’s Border: The Case for Post-structuralist Area Studies”, i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in Southeast Asia*, Vol. 18, No. 1, 2003, pp. 42–88；汤蓓、扈赫扬：《制度环境与国际组织的知识生产》，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 年第 6 期，第 128–155 页；《区域国别研究：新视野与新方法》，载《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三十三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 年。

⑤ 章永乐：《区域国别研究回应殖民帝国的三种立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https://mp.weixin.qq.com/s/Fn_r1ltkszM78CpkhRzw.[2025-02-22]

⑥ 章永乐：《“大国协调”与“大妥协”：条约网络、银行团与辛亥革命的路径》，载《学术月刊》，2018 年第 10 期，第 91–109 页。

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世界动荡变革的背景，中国的区域国别学需要充分在域外传播中国特色的对外合作理念，改变欧美的“理论霸权”和“话语霸权”。这不仅对区域国别知识生产提出了新需求，更对生产什么知识和怎样生产知识提出了新要求。^①

（二）区域国别及拉美知识生产

区域国别研究作为一种知识生产过程，是关于外部世界的知识性探究。^②区域国别学成立前后，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和知识生产。这些内容主要包括学科名称的规范、学科边界、学科发展动力、学科化、研究机构实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研究方法等。但是，在涉及区域国别研究的诸多重大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并不宜过早提出范式革命。^③具体到知识生产体系，服务于国家战略的中国区域国别研究应该打造学术、政策、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型知识生产体系，形成交叉性、整体性和反身性互促的知识形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和中国自主学科建设三大方向上寻找自主性知识生产方式。^④随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调整，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尤其是以美国区域研究为代表的基于权力等级制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已无法适应以全球权力转移、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重构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转型的现实需求。区域国别研究的范式需要创新：认识论上需强化文明互鉴理念，本体论上需强化系统认知模式，方法论上需强化科学意识。^⑤

拉美研究学者在社会科学和人文领域中发展出了一些极为重要且具影响

① 朱翠萍：《区域国别研究的难点与学术启示》，载《印度洋经济体研究》，2023年第1期，第1-2页。

② 任晓：《区域国别研究的几个维度》，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年第4期，第80页。

③ 相关研究参见李晨阳：《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别与区域研究范式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0期，第143-155页；周鑫宇：《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路径与方向》，载《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4年第5期，第96-105页；汪卫华：《“解耦”还是“脱钩”？——比较政治与区域研究的关联》，载《国际政治研究》，2021年第6期，第9-32页；赵裴、姜锋：《区域国别学的内核与学科边界》，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第73-81页；程多闻：《区域研究与学科之间的争论与融合》，载《国际观察》，2018年第6期，第135-154页。

④ 杨体荣、翟崑：《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功能型知识生产体系》，载《北大区域国别研究》（第7辑），2023年，第25-46页；许勤华、柳震：《区域国别学的自主性构建：以英美俄早期区域国别研究为例》，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4年第4期，第108-123页。

⑤ 杨成：《中国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建设的范式创新路径》，载《国际关系研究》，2025年第1期，第17-18页。

力的理论,并为相关辩论做出了贡献。从依附理论到民主化研究,从国家研究到社会运动研究,拉美研究的学者们始终站在多个学科理论发展的前沿。美国的拉美研究源自外交史和国际关系,主要从“北半球的视野”研究拉美。20 世纪初,美国学术界越来越关注美国在拉美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并于 1926 年成立了拉美历史学会。与此同时,美国的各类私人基金会提供资金支持对拉美的研究,美国在拉美研究领域实现了学术界、政府和私人基金会紧密合作的三角关系。冷战形塑了美国的拉美研究,关于拉美的知识生产服务于美国在冷战中针对苏联、颠覆拉美共产主义政权的战略目标。^① 美国学者将这种知识强加于拉美,部分拉美学者不加批判地接受了包括美国经济模式在内的发展知识。尽管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地位并不对等,但西半球国家之间的学术合作从未间断,关于拉美的知识生产始终是一项跨国事业。随着冷战的结束,拉美研究在美国学术界的地位也有所下降,越来越多以拉美地区研究为主题的项目面临激烈的资金资助竞争。^②

2000 年前后,“拉美学”曾经在中国学术界得到讨论。尽管尚不存在独立的拉丁美洲学科,但基于传统西方社会科学六大门类,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国际关系等角度对拉美历史和现实问题进行宏观和微观分析的研究具备成为一门特定地区性学科的可能性。但是,在建立学科之前,需要明确国别学与国别研究、地区学与地区研究、个案和整体、短期政策研究和长期理论研究等几对关系的区别。^③ 201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课题组对当代中国的拉丁美洲研究进行了翔实、系统的总结和梳理,将拉美研究定位为一门跨越传统知识门类的交叉新学科。课题组按照政治、经济、国际关系和社会文化四个板块完整呈现了中国拉美研究四个学科从无到有的发

① Ronald H. Chilcote, “The Cold War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45, No. 4, 2018, pp. 6–41; Paul W. Drake and Lisa Hilbink, “Latin American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22–48; Richard Lambert, “Blurring the Disciplinary Boundaries: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33, No. 6, 1990, pp. 712–732; Deborah Cohn, “U. S. Southern and Latin American Studies: Postcolonial and Inter-American Approaches”, in *The Global South*, Vol. 1, No. 1, 2007, pp. 38–44.

② Jacob Heilbrunn, “The News from Everywhere: Does Global Thinking Threaten Local Knowledge?”, in *Lingua Franca*, May/June 1996, pp. 49–56.

③ 张森根:《一门有待拓深的新学科—拉丁美洲学》,载《拉丁美洲研究》,1990 年第 4 期,第 51–52 页;水工:《慎用“拉美学”的提法》,载《拉丁美洲研究》,1999 年第 5 期,第 61 页;徒温:《拉美研究有别于“拉美学”》,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 年第 2 期,第 61 页。

展历程和学术成果。^① 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立前后，包括拉美学在内的“地域性学科”也得到了讨论。^② 相较于美国、英国等国家，中国的拉美研究在研究力量、研究机构、研究成果、培养学生人数等方面均略显不足，远未达到西方综合、全面的多学科体系。如果按照研究队伍的规模、学术共同体的机制化、所培养学生的分布等方面的现实标准来评价，中国的拉美研究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共同研究范式或纲领上的共识更有待实现。^③ 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成立后，国内更倾向于在区域和学科两个维度部署二级学科，拉美研究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④

中国的拉美研究队伍总体上是一个水平较为有限的研究团体，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方面落后于世界的拉美研究，与世界拉美研究的对话交流也有限。特别是近年来在国内评价体系的影响下，有关中拉关系的研究全面挤占了拉美研究的空间，影响了中国关于以拉美为客体的知识生产，已有知识得不到更新，知识盲区得不到开拓。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多种多样。其中，关于以拉美为代表的“他者”知识生产能力不足而不得不通过西方“第三只眼睛”观察、理解、解释拉美，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一方面，国内从事专业研究的拉美研究者受语言限制，缺少一手文献的支持。高难度的西班牙语及葡萄牙语构成了一个较高的学术门槛，各学科专业的研究者在当前的学术评价体系下不会投入太多精力去专门学习语言。一手文献的缺失导致大量涉及拉美的知识来自西方英语世界的知识生产，被加工之后的知识打上了西方的烙印。另一方面，国内从事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专业的研究者缺少学科训练，难以完成高效的信息加工。语言专业出身的拉美研究者可以及时接触到一手信息和一手文献，但是割裂的学科建制影响了这一类研究者的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能力。^⑤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编：《当代中国拉丁美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

② 刘鸿武：《中国区域国别之学的历史溯源与现实趋向》，载《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第55页。

③ 张宇燕：《对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的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1期，第3页。

④ 王逸舟、严展宇：《探索中国国际关系的多维向度：科学、人文与艺术》，载《国际观察》，2020年第5期，第1-32页。

⑤ 参见郭存海：《中国拉美研究70年：机构发展与转型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年第4期，第5页；韩琦：《大陆高校的拉美研究及与台湾高校的合作前景》，载《拉丁美洲经贸季刊》（中国台湾），2017年第29期，第10页；王晓德：《中国拉丁美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载《拉丁美洲研究》，2021年第1期，第1-35页。

（三）对现有文献的评述

为什么要建构中国关于拉美的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一是外在的功能性要求。中国的拉美知识生产是摆脱西方知识体系窠臼和“污名化”陷阱，服务于平等、互利的中拉关系发展的需要。二是内在的本质性要求。中国的拉美知识生产是以拉美为先行先试区，践行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需要。在各学科大力倡导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背景下，拉美研究领域似乎仍然是“孤岛”。大多数拉美研究或是从西方经济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出发，或是在西方话语体系的问题脉络中展开，其原因无非有两点：其一，相较于西方国家的拉美研究，中国的拉美研究起步晚，在知识生产上处于后发或追赶者的角色，存在“时间差”；其二，中拉关系大发展是较为晚近的事情，且以经贸联系的深化为先导，在文化、社会、思潮等软实力领域同西方国家拉美研究相比存在“位置差”。在“时间差”和“位置差”的综合作用下，拉美研究的知识生产实现了某种知识权力，即“权力差”，导致“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中国关于拉美区域国别知识生产另起炉灶的难度较大。尽管有研究提出中国的拉美研究需要重建，但如何重建、重建的目标以及价值取向仍不明朗。

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机构长期停留在对特定国家或地区历史与现状描述的初级阶段，缺乏学术意识和理论思维，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区域国别研究的延展性。^①从知识生产的角度反思这种论述，三类知识并无高低之分：描述性知识构成了学科的基础，学理性知识支撑了学科的内核，应用性知识发挥了学科的功用。^②本文聚焦于中国和美国关于拉美的知识生产，不仅要服务于中国区域国别学学科建设和研究范式的构建，更要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拉美区域国别知识生产。因此，遵循从“时间差”“位置差”到“权力差”的分析路径，本文旨在通过对拉美研究案例的分析，为构建中国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做出一定的边际贡献。

二 知识、权力与区域国别学的双重面向

区域国别研究带有与生俱来的“西方中心”特质，从世界体系中“外

^① 任晓、孙志强：《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历程、趋势和方向》，载《国际政治研究》，2020 年第 1 期，第 146 页。

^② 秦亚青：《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构成》，载《国际论坛》，2022 年第 6 期，第 4-9 页。

围”国家自身视角出发的研究较少。^①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知识权力随物质权力变动而更新，以美国区域研究为代表的基于权力等级制的“西方中心主义”范式已无法适应以全球权力转移、国际体系转型和国际秩序重构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转型。无论是学术导向的基础理论研究还是问题导向的应用对策研究，都呼唤知识生产的范式变革。

（一）知识生产与知识权力的辩证关系

“知识”一词及相关现象早已得到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关注与热议。^② 然而，很少有学术文献对“知识”概念本身进行严格的界定。一般情况下，我们可以将知识视作在一定时空中被一定群体承认为真的信息。^③ 因此，知识生产就是发现、创造原先不存在的信息，或者反驳、更正原先被误认为真的信息，进而形成知识增量，帮助人类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④

虽然不乏偶然性和非线性，但知识生产并非漫无目的，也从不是存在于真空之中。知识生产往往既受到权力的引导和制约，又推动权力和演变。在各个时空中的各个群体内，能否进行知识生产、如何进行知识生产、谁来进行知识生产、怎样评价知识生产，几乎都无法摆脱既有知识体系的总体结构，而这种总体结构在本质上由权力规定。^⑤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将人类和社会的某些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和问题就是权力运作的直接结果。^⑥ 譬如，1952年中国高校院系调整中，政治学系被取消，很多政治现象就不再被学者关注，相关的知识生产也陷入停滞。直到邓小平提出“需要赶快补课”后，政治学的知识生产才开始恢复。即使在看似与权力联系并不紧密的自然科学

① 王飞、刘晓玉：《新型智库视角下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年第2期，第88页。

② [德] 卡尔·曼海姆著，黎鸣、李书崇译：《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法] 米歇尔·福柯著，董树宝译：《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王心怡、孟天广：《知识政治学：国家治理中的知识生产与调用》，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2期，第6-24页。

③ Ettore Bolisani and Constantin Bratianu (eds.), *Emergent Knowledge Strategies: Strategic Thinking in Knowledge Management*, Cham: Springer, 2017, pp. 1-22.

④ 参见 Rajan Gurukkal, *History and Theory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 Introductory Outlin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9；傅翠晓、钱省三、陈劲杰、张睿：《知识生产研究综述》，载《科技进步与对策》，2009年第2期，第155-160页；王牧华、魏会超：《知识生产视域下的大学教学改革：现实挑战与实践路径》，载《中国教育科学》（中英文），2024年第5期，第98-106页。

⑤ [法] 米歇尔·福柯著，董树宝译：《知识考古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

⑥ [法] 米歇尔·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6页。

领域，知识生产也必须遵循特定共同体所承认的范式，而范式的延续与转换本质上都离不开权力的支持。^① 譬如，1948 年，苏联科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将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批判为异端邪说，导致苏联生物学迟迟未能迎来范式转换。

相较于权力对知识生产的影响，知识生产对权力的影响虽然更为隐蔽，但同样重要。出于本文主题和篇幅的考虑，我们主要探讨知识生产对权力的积极影响，此外还需要大致区分软权力和硬权力。^② 所谓硬权力，即 A 通过奖励和惩罚来强制 B 采取违背 B 之意愿的行動的能力，也即支配性权力，在当代世界政治中主要表现为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所谓软权力，即 A 吸引 B 自愿为追求 A 之目标偏好而行動的能力，也即规范性权力，在当代世界政治中主要表现为意识形态权力。

基于上述讨论，不难发现知识与权力之间的关系。首先，知识生产辅助硬权力。古今中外有很多知识生产直接面向权力精英，或是为潜在的权力精英提供有关如何获取和运用硬权力的指导。^③ 其次，知识生产成就软权力。国家认同的建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精英对历史中各类观念要素的遴选、改造与传播，统治的合法性也需要知识精英适时提供论据、叙事和话语体系。^④ 再次，知识生产加剧权力差。一般情况下，由于权力结构的不平等，也即权力差的存在，权力精英总是得以更快地接触且更好地掌握更新更全的知识，而普通公众的知识学习则难免表现出相对滞后性和片面性。换言之，知识生产越发达，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的知识差（knowledge gap，又译为“知识沟”或“知识鸿沟”）就越大。这使得权力精英越发强大，而普通大众则

① [美] 托马斯·库恩著，张卜天译：《科学革命的结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2 年。

② 参见 Robert O. Keohane and Joseph S. Nye Jr., “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in *Foreign Affairs*, Vol. 77, No. 5, 1998, pp. 81–94; 唐世平：《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载《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2010 年第 1 期，第 84–107 页；[英] 迈克尔·曼著，刘北成、李少军译：《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

③ 参见 [美]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等著，程逢如译：《联邦党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年；[意] 尼科洛·马基雅维利著，潘汉典译：《君主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年；高华平等著：《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

④ 参见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books, 1991; Anthony D. Smith, *Nationalism: Theory, Ideology, History*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赵鼎新：《国家合法性和国家社会关系》，载《学术月刊》，2016 年第 8 期，第 166–178 页。

越发脆弱，进而形成“权力差—知识差”的正反馈循环。^①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知识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特殊的软权力，也即知识权力的表现形式。知识生产主要涉及两类主体，即知识生产者和知识应用者。知识生产的本质是将知识生产者的观念转化为知识应用者的观念。在这一过程中，知识生产者改变了知识应用者原先的目标偏好，而施加了自己的目标偏好。那么，无论知识生产者在主观上对知识应用者是善是恶，他都在客观上具备了切实影响知识应用者行动的能力。当然，值得注意的是，此处的知识生产者指代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的集合体。归根结底，知识权力并不真正属于知识精英，而是由权力精英掌握、知识精英代持。这是因为，知识精英本身就由权力精英设定和支配，不掌握其他权力的知识精英往往仍然只是社会的中间阶层而绝非统治阶层。^②也正因如此，虽然知识生产能够赋能其他权力，但知识权力的大范围有效运行往往也离不开其他权力的加持。

（二）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目的与意义

在人类既有的知识体系中，区域国别知识直接关乎国家兴衰与国际和平，是最为敏感、最为重要、最为综合的知识群落之一，也是最容易服务权力乃至产生知识权力的知识群落之一。在一定程度上，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的核心目的和终极意义就是形成和维系知识生产者之国家在世界政治中的权力地位。^③当然，此处的知识生产者仍然是指代整体意义上的知识精英和权力精英的集合体。在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过程中，作为个体的知识精英未必抱有以知识服务权力或掌握知识权力的明确目的，也未必能完全预见知识产品的应用去向。譬如，17世纪的环球旅行热潮和19世纪的地理学研究进展产出了大量的地图等知识产品，但出乎很多旅行家和地理学家的意料，这些知识产品并不限于学术圈和同行内部传播应用，而是很快成为殖民扩张、军事行动和

^① 参见 Avinash Persaud, “The Knowledge Gap”, in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2, 2001, pp. 107 – 17; [德] 诺贝特·埃利亚斯著，刘佳林译：《论文明、权力与知识》，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韦路：《从知识获取沟到知识生产沟——美国博客空间中的知识霸权》，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8期，第139 – 153页。

^② 参见 Charles Wright Mills, *The Power Elit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harles Wright Mills, *White Collar: The American Middle Class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意大利] 安东尼奥·葛兰西著，曹雪雨等译：《狱中札记》，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6年。

^③ 刘春荣：《地缘政治与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转型》，载《世界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第154 – 169页。

商业经营的利器。^①

作为交叉学科，区域国别学整合跨学科知识，通过“各区域内部的跨学科研究”和“跨区域的同议题研究”丰富中国对于全球不同区域和不同国家的知识储备。^② 这两类研究都可以直接服务权力乃至产生知识权力，但具体表现形式又有所不同。区域内部的跨学科研究侧重于提供该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多方面的整体图景，因此可以直接帮助知识应用者更为系统高效地认识区域，进而可以在战略预判的基础上直接服务于区域合作或竞争，甚至是对区域的干涉与征服。跨区域的同议题研究侧重于通过不同区域的求同求异提炼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特殊规律和一般规律，因此可以直接帮助知识应用者更好地理解观念、行动、政策、制度的可能后果，进而可以在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直接服务于国家治理与现代化进程。因此，从知识生产者所在国家的视角来看，区域内部的跨学科研究是外交事务的重要基础，跨区域的同议题研究则是内政事务的重要基础。当然，当这些区域国别知识随着理论学习和话语传播从某国向外扩散时，某国也就在世界政治中拥有了某种知识权力。

相较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意识形态属性更强。其中，区域国别知识的意识形态属性更为突出。^③ 因此，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得失直接关乎国家软权力的成败。一方面，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都需要关于“他者”^④ 和“外部”^⑤ 的系统知识来维系和强化自身的国家认同与内部的文化自信。另一方面，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是防范“精神殖民”、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防线，因为外部传入的区域国别知识很可能在无形中持续毒害本国权力精英、知识精英和普通大众。

① [法] 米歇尔·福柯著，严锋译：《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178 页。

② 王飞、刘晓玉：《新型智库视角下的区域国别学科建设》，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 年第 2 期，第 93 页。

③ 高翔：《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根本遵循》，载《人民日报》2023 年 12 月 6 日第 9 版；高明：《深刻把握区域国别学的多重属性》，中国社会科学网，2025 年 3 月 5 日。https://www.cssn.cn/qygbx/202503/t20250305_5855694.shtml [2025-03-21]

④ 姬德强、薛宇涵：《他者之镜：区域国别学视域下的国际传播研究》，载《对外传播》，2024 年第 7 期，第 9-13 页。

⑤ 任晓：《区域国别研究的几个维度》，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23 年第 4 期，第 79-81 页。

三 时间差：拉美知识的存量与增量

区域国别研究随着西方殖民者的殖民活动而兴起。作为冷战的产物，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服务于其政治议程，为政府决策提供参照。^① 由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起步早，时至今日，借助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知识库仍然是获取某一地区或国家专业性、学术性知识最直接有效的方式。^② 这种基于时间优势的知识生产，为美国主导国际格局奠定了基础。中国作为拉美知识生产的后来者，在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中，具备供给知识增量从而优化知识存量的能力。

（一）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方式

知识生产方式是指知识生产的系统性规律、机制和过程，包括知识的创造、传播、应用等环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冷战期间可以称为工业知识时代。在这一时期，虽然已经开始出现向服务经济和知识经济转变的趋势，但工业依然占据重要地位。工业生产中不断产生新的技术知识、管理知识等，工业发展与知识生产紧密相连。因此，在这一时期，新的工业技术、工艺开创了新的知识领域，企业和科研机构等在工业相关知识的不同层面进行开拓，努力占据更多的知识版图，也可称为“知识占位拓展期”。这种经济层面的“身位领先”实际上是发展起步时间较早的结果。美国 and 大多数拉美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的时间相差只有短短几十年，但美国在独立后形成了完整的资产阶级政治体制，有效促进了国内经济发展；拉美国家却受后殖民时期的政治遗风影响，经济发展缓慢。地理上的“西半球观念”使拉美国家羡慕美国并效仿其发展模式。^③

从1943年起，“区域研究”在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等学术机构领导层的规划下逐步完成了机构设置任务，基本上形成了稳定的学术范式与制度格局，标志着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正式形成。^④ 随着美国同拉美经贸联系密切程度的提高，美国的研究重点逐步从人文科学转向社会科学，美国国内还出

^① Bruce Cumings, “Boundary Displacement: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during and after the Cold War”, in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Vol. 29, No. 1, 1997, pp. 6–26.

^② 马思妍、李晨阳：《关于构建中国特色国别研究体系的思考——以缅甸研究为例》，载《东南亚研究》，2023年第3期，第37页。

^③ 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研究美拉关系的一条主线》，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8页。

^④ 李秉忠：《区域国别学的西方传统和中国路径》，载《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第18页。

现了“拉丁美洲热”^①。拉美国家的教育体制受西方影响大，法国百科全书派和美国行为主义学派深刻影响了拉美本土课程的选择和设置。美国拉美研究的学者也经常邀请来自拉美国家的学者参与课题研究，这同样塑造了关于拉美的知识生产。^② 无论是普遍主义范式下的现代化理论，还是相对主义范式下的依附理论，抑或是全球主义范式下的多元研究，美国关于拉美的知识生产同美国的经济节奏、美国对拉美的战略需求密切相关。^③

大数据和人工智能（AI）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方式，智能化的学术工具加快知识存量更新并加速知识增量产出。数字时代，强调运用数据挖掘技术揭示海量数据背后规律的数据驱动研究范式打破了传统文科研究路径，塑造了新的知识生产方式。^④ AI 时代的知识大爆炸使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生产从规则的线性系统转变为集复杂性、机器学习、智能决策为一体的智能体，信息成为这一智能体的核心关键。在人机交互情境下，个人偏好和情境的相关性形成了一种知识共创模式，推动现有知识内容的创新。这意味着知识生产的存量和增量将面临一场革命，已有知识存量能够通过 AI 大模型的更新挤压新知识增量的生产空间，并加速已有知识的传播。此外，文献研究搜寻与分析、论文写作、学术成果出版等均将得到提速。^⑤

随着知识生产方式的变革，“另类事实”（虚假信息、错误信息及恶意信息）爆发式生成使知识生产面临失序风险。在“情绪屡屡跑赢真相”的后真相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背后的控制方会因自身立场、资本逻辑和政治需求等因素在舆情事件中做出操纵舆论的行为。^⑥ 近年来，随着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不断加强，国外开始炒作“中国正在控制拉美”“中国威胁论”“债

① 张森根：《一门有待拓深的新学科——拉丁美洲学》，载《拉丁美洲研究》，1990 年第 4 期，第 52 页。

② 黄志成、郭有鸿：《拉丁美洲课程论透视》，载《全球教育展望》，2001 年第 9 期，第 54-57 页；Paul W. Drake and Lisa Hilbink, “Latin American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22-23.

③ 史艳、赵可金：《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兴起、进展与镜鉴》，载《国际政治研究》，2020 年第 4 期，第 49-81 页。

④ 孟天广、严宇：《文科实验室：数字时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设施”》，载《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 年第 2 期，第 21-30 页。

⑤ 储节旺、杜秀秀：《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科研知识生产研究述评》，载《大学图书馆学报》，2024 年第 3 期，第 110-111 页。

⑥ 张文祥：《生成式人工智能虚假信息的舆论生态挑战与治理进路》，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1 期，第 155-164 页。

务陷阱”“拉美对中国新依附”等论调，严重干扰了中拉关系的正常发展。^①

信息技术的崛起实现了知识传播的革新，知识流通加速，知识形态的碎片化也愈发明显。AI 思考速度快、记忆力强，在知识整合和知识更新方面具有超越人类智能的巨大优势。但是，无论是“另类事实”还是对 AI 的不合理使用，均暴露出 AI 时代所生产知识的可信度存在被放大的风险。尽管这不是一个新问题，无论在报纸、广播、电视还是移动互联网时代，炮制“另类事实”的事件乃至产业都并不罕见，但 AI 时代这种操控能力被极大加强，产生的舆论冲击力也被放大。例如，“阿根廷总统米莱计划访华”这样缺乏明确信源的内容自 2024 年以来被广泛转发，背后很可能就有西方社交媒体机器人的推动作用。

（二）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路径

作为多学科交叉的知识生产模式，区域国别知识通过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两种路径生产出来。美国区域研究成果最为丰硕，在理论、方法、研究范式、知识生产路径等方面领先世界。美国高校的地区研究率先实现制度化，以特定区域为核心的课程设置、研究课题和合作平台已经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核心组成部分。^② 在这一进程中，美国的区域研究实现了与学科的“对话”，比较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经济学等学科使用拉美作为案例，印证学科知识，关于拉美的知识生产被固化，嵌入西方的学科理论和学科实践中。1966 年，拉美研究协会（LASA）成立，除得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财政支持外，还获得了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等私人基金会的支持。拉美研究协会的支持者希望将其变为美国外交政策机构的组成分支，因此关于拉美的

^① Ruben Gonzalez - Vicent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Sino - Peruvian Relations: A New Dependency?”, in *Journal of Current Chinese Affairs*, Vol. 41, No. 1, 2012, pp. 97 - 131; Sascha Hannig, “El Encanto del Dragón: La Estrategia China de Influencia en América Latina”. <https://fppchile.org/el-encanto-del-dragon-cual-es-la-estrategia-china-de-influencia-en-america-latina/>. [2023 - 08 - 04]; “El Futuro y la Polémica de las Inversiones Chinas en Chile”, FPP. <https://fppchile.org/el-futuro-y-la-polemica-de-las-inversiones-chinas-en-chile/>. [2023 - 08 - 04]; Guillermo Barba, “La Ruta de China para Dominar al Mundo”, CISLE. <https://cisle.org.mx/la-ruta-de-china-para-dominar-al-mundo/>. [2023 - 08 - 04]

^② David L. Szanton, “The Origin, Nature, and Challenges of Area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L. Szanton (ed.), *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 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pp. 4 - 5.

学术研究也就具有了为美国对外政策服务的战略属性。^① 美国构建地区研究的庞大学术群落和跨学科制度体系等经验值得借鉴，但如果直接照搬这些经验，就会落入“西方中心主义”陷阱中。例如，中国拉美研究群体熟知的美国著名学者戴维·马拉斯就曾指出，国际关系学中存在各种“拉美难题”（Latin American Puzzles），即基于西方理论化的概念在拉丁美洲并不完全适用。这种局限性主要源于不完整的、带有偏向性的因变量描述以及未明确阐述的自变量。^② 又如，西方经济学界长期存在的“制度崇拜”同样在中美洲国家被证伪：按照西方国家发展经验设计的“好制度”反而阻碍了中美洲国家的发展，并加剧了社会不平等。^③

基于基础理论指导的实践，也存在先行者指导后来者的可能性。新自由主义在拉美的实践就是“制度崇拜”论的现实镜像。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种学术理论和政策经验均带有资本化倾向，一旦被资本化，其反映的就不再是纯粹的普遍性规律或真理性认识，知识从而也就具有了阶级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两次石油危机的爆发，全球经济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全面失语。作为国家干预的对立面，新自由主义出场。英国撒切尔夫人的改革和美国里根政府的改革再次缓解了彼时已经激化的资本主义生产矛盾，新自由主义从而以胜利者的旗帜被输出。一旦外在的政策内化为观念意识，这种政策的知识体系就会转变为权力，“以其宿命论的规律环绕着人的第二自然”^④。在拉美，美国利用各种手段进行新自由主义的推广：一是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金融机构干预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等拉美国家的结构性改革^⑤；二是通过培训“芝加哥小子”向以智利

① Russell Bartley, “The Piper Played to Us All: Orchestrating the Cultural Cold War in the USA, Europe, and Latin America”, 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 Culture, and Society*, Vol. 14, No. 3, 2001, pp. 571–619.

② David R. Mares, “The Latin American Puzzles for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Oxford Research Encyclopedia of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③ 释启鹏：《“好制度”为何不能总是带来“好结果”？》，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1 年第 5 期，第 184–193 页。

④ [匈] 卢卡奇著，杜章智等译：《历史与阶级意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年，第 326 页。

⑤ 美国在推动本国资本项目自由化之前，就凭借自身对 IMF 的控制权率先打破了全球南方国家的资本管制。彼时，以拉美国家为代表的全球南方国家需要依靠 IMF 的资金支持维系国内的进口替代工业化，而 IMF 发放贷款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贷款国开放资本账户。具体可参见 Jeffrey M. Chwieroth, “Normative Change from Withi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s Approach to Capital Account Libera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2, No. 1, 2008, pp. 132–134.

为代表的拉美国家输送新自由主义的理念和人员^①；三是宣介自身“成功经验”，将“华盛顿共识”嵌入拉美国家的改革进程，将私有化、市场化和自由化推行到底。^②当拉美国家本土的行为体以“本土化”融合本土规范和外来规范，知识的嵌入将会更加根深蒂固。^③

四 位置差：拉美知识供给的目标导向

掌握了叙事话语权的西方国家在科教文化和思想等方面将其定义为具有文明性和先进性的群体，肩负着教化“愚昧、落后”种族的责任。无论是欧洲区域国别研究的兴起，还是现代意义上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建制化，都带有明显的殖民主义特征和种族偏见。相较于美国从上层“俯视”拉美，现代化起点先于中国的拉美具备为中国提供经验教训的潜质，而这种先验知识的传播有利于“共情”，塑造中拉合作的哲学基础。

（一）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面向

西方区域国别研究与殖民扩张相伴而生，其知识生产也具有居高临下的姿态，服务其自身霸权。作为美国“门罗主义”首当其冲的目标，拉美被美国视为必须掌控的区域，美国和拉美国家的关系始终保持一种不平等。^④美国将拉美视为其特殊的势力范围，美国关于拉美的知识生产也是为其霸权服务的工具。事实上，“拉丁美洲”并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其本身就带有地缘政治含义。“西半球观念”由美国学者阿瑟·惠特克（Arthur P. Whitaker）提出，而其蕴含的“西半球经济—安全共同体”理念不仅成为美国政客对拉美政策的解释，也被诸多拉美国家的政策制定者、精英、普通民众广泛接受。^⑤事实上，这一概念只是美国试图将拉美纳入其势力范围的一种伪善之词，当观念转化为现实，这种知识便成为美国霸凌拉美、维护其在西半球霸权地位的手

^① Sebastian Edwards, *The Chile Project: The Story of the Chicago Boys and the Downfall of Neoliberalis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3.

^② Kuczynski Pedro – Pablo and John Williamson, *After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Restarting Growth and Reform in Latin Americ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③ Amitav Acharya, “How Ideas Spread: Whose Norms Matter? Norm Loca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Asia Regionalism”,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8, No. 2, 2004, pp. 242 – 243.

^④ 洪国起、王晓德：《冲突与合作：研究美拉关系的一条主线》，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第4页。

^⑤ Arthur P. Whitaker, “The Origin of the Western Hemisphere Idea”, in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 Vol. 98, No. 5, 1954, pp. 323 – 326.

段。无论是在 1902—1903 年间美国针对德、英、意的“委内瑞拉索债事件”，还是在 1982 年“马岛战争”中公然支持英国，抑或是在 2025 年年初“收回巴拿马运河”剑指中国，美国的霸权行径均凌驾于拉美国家的切身利益之上，用所谓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安全”服务于自身外交战略。

随着殖民和霸权的瓦解，西方的区域国别研究遭遇了诸多危机。中国与广大后发国家有着极其相似的历史遭遇，这种历史决定了中国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更多地体现了平等和合作的色彩。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这是中国基于对外部世界关系认知的国家定位。聚焦到拉美，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中拉关系是平等互利、全面发展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中国与拉美国家的文明对话和交流互鉴是新时代全球南方国家之间互动的生动体现，服务于中拉共建“一带一路”与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在中拉文明交流互鉴中进行的知识生产可以作为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外延，这是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与西方区域国别学的根本差异之一。^② 在文化自觉的内生动力驱动下，批判和反思西方知识霸权，基于对拉美特殊性的承认生产区域国别知识，通过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形成客观、平等的拉美知识。这是应对中国和拉美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所必需的，也是构建融普遍性和特殊性于一体的全球南方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的可行路径。基于上述定位，可以用最一般性的概括来指明中国和拉美国家面临的根本挑战和历史任务，那就是“发展”。正如 2023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致辞所提到的，“越来越多的地区、国家同中国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支持并参与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同中方携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③

以发展为导向的“一带一路”倡议突破了现行的以规则为导向的全球治理模式。中国和拉美国家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充分体现出拉美国家期待寻求多元发展、摆脱西方国家束缚的诉求。秉承正确义利观、遵循共商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60 页。

② 《访谈 I 任晓 杨成 陈晓晨：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上观，2024 年 11 月 11 日。<https://sghexport.shobserver.com/html/baijiahao/2024/11/11/1458983.html>.[2024-12-12]

③ 《习近平向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第七届峰会作视频致辞》，新华网，2023 年 1 月 25 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3-01/25/c_1129311146.htm.[2025-02-25]

共建共享原则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其惠民生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双重吸引力，得到了拉美国家的积极响应。无论是以智利、秘鲁等为代表的通过同中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积极融入中国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拉美开放型中等经济体，还是以巴西为代表的通过同中国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命运共同体实现同“一带一路”发展战略对接的拉美大国，均用实际行动为变革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投下了赞成票。

（二）区域国别知识的生产内容

21 世纪中国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以传统的西方学理性和描述性知识为主，均呈现出一种西方价值主导的特征。这主要源于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历史积淀，即早期西方区域国别知识生产者“俯视”非西方世界所积累的知识。这种西方价值主导的知识生产还反映出“我者”“他者”二元对立的国际科学研究格局，即全球学术体系依赖于全球劳动分工，实体经济的“位置差”投射到学术体系中。^① 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生产应该是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并重。有研究认为，中国拉美研究过度的“政策导向”抑制了学术研究的活力。^② 这种说法可能并不准确，原因在于未能厘清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二者并非简单的二元对立。中国拉美研究的问题在于与“与学科对话”的能力弱。^③ 相较于西方将拉美作为学科案例的做法，中国的拉美研究只是“就拉美谈拉美”，或者说，没有从描述性知识升华至普遍性知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推动西方国家区域研究向学理化、科学化发展的动力是比较政治学、世界经济史、海外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的新分类，以国家和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研究也给这些新兴学科贡献了鲜活的案例。这种区域国别研究的国家主义范式引领了二战后世界各国的区域国别学发展，具有既强调战略研究又重视政策研究的发展特色。^④ 冷战结束后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

① 段寻、郜然、杨体荣：《21 世纪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知识谱系的特征与构建——基于多学科知识生产的比较分析》，载《外语学刊》，2024 年第 4 期，第 103 页；Ariel I. Ahram, Patrick Köllner, and Rudra Sil (eds.), *Comparative Area Studies: Methodological Rationales and Cross - Regional Applic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9.

② 郭存海：《中国拉美研究 70 年：机构发展与转型挑战》，载《拉丁美洲研究》，2019 年第 4 期，第 1 页。

③ 郭洁：《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拉美研究》，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 年第 5 期，第 86 - 108 页。

④ 赵可金、尹一凡：《建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载《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23 年第 6 期，第 68 页。

化转型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学术界视区域研究为范式发展程度低下、研究方法科学性较差的一类研究，区域研究生产的知识则被视为缺乏理论一般性的特殊性知识。^① 美国的这种知识生产范式更多是一种“形而上的范式”，仅仅代表了一种美国信仰和美国假设。例如，传统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依附理论源自劳尔·普雷维什对拉美国家长期的跟踪和敏锐的洞察，而一些美国学者实行“拿来主义”，用这个概念来描述新时代的中国和拉美国家关系，显然缺乏对 21 世纪以来中拉经贸关系大发展的精准把握。美国知名拉美问题专家芭芭拉·斯托林斯（Barbara Stallings）在中拉金融合作问题上将直接投资、发展融资、官方援助、经济合作等要素融合在一起，且未区分政策性银行和开发性金融机构，得出“中国和拉美的金融合作掺杂政治目的”的错误结论，甚至提出“拉美对中国存在金融依附”的错误见解。^②

20 世纪末期，美国强调学科的科学性，行为主义、实证主义和量化研究方法挤占了科学性“不足”的传统区域国别研究的生存空间，以亚非拉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案例成为证实或证伪西方理论、助力理论创新的案例。基于地方性知识的研究范式遭到质疑，区域研究在学科建制中探索发展机会。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特别是随着“全球南方”概念和理论的发展，区域研究回归到学术大视野中，区域知识谱系也得到整体审视与重构。^③ 从冷战土壤中脱胎出来的“全球南方”概念突破了传统的南北对立格局，适应了多元化世界的需要。但是，西方学者也在适应这种新变化，并且在理论层面构造新的“位置等级”。俄乌冲突的一个潜在影响是将世界推向了一个新的“三个世界”叙事，即全球西方、全球东方和全球南方。^④ 这种观点以沃勒斯坦“世界体系理论”为基础，试图将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割裂来反映全球权力和极化的转向，从而将包括拉美国家在内的曾经的第三世界国家视为全球西方和全球东方“争夺”的对象。

我们需要警惕这种学术层面带有偏见的知识生产。聚焦到中国的拉美研

① Paul Chynoweth,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terdiscipline”, in *Structural Survey*, Vol. 27, No. 4, 2009, pp. 303–304; Gerardo L. Munck, “Between Theory and History and Beyond Traditional Area Studies: A New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on Latin America”,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25, No. 4, 1993, pp. 475–498.

② Barbara Stallings, *Dependen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hina-Latin America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 49–54.

③ 谭萌：《海外研究的“区域”知识谱系及其变迁》，载《世界民族》，2024 年第 5 期，第 34 页。

④ G. John Ikenberry, “Three Worlds: The West, East and South and the Competition to Shape Global Order”,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00, Issue 1, January 2024, pp. 121–138.

究，最重要的就是同世界的拉美研究进行“学科对话”。这种对话一定是基于自主性的对话，标识性概念和标识性元素非常重要。无论在美国还是在中国，聚焦拉丁美洲的经典教材多由西方学者撰写，这不可避免地形成了西方“居高临下”的、带有偏见的拉美知识生产。例如，由英国学者撰写的《独立以来的拉丁美洲经济史》自1995年首次出版后，先后在2000年和2014年再版两次，并且全部被翻译成中文，是中国拉美研究专业的必备教材。作者在有关拉美发展落后成因的讨论中尽管同时关注内部和外部因素，但他强调“拉美应该在地区内部寻找落后致因”而否认“外部因素总是对拉美造成不利影响”，这一观点显然不符合拉美从殖民地时期到独立后数百年的发展进程。^①又如，美国学者撰写的《现代拉丁美洲》首版于1984年，至2018年已更新至第九版，是获取拉美知识最权威的教材之一。该书第一版和第七版被译成中文，同样是中国拉美研究必备参考书目。但是，这本著作在论述独裁—专制体制、官僚—威权体制、民粹主义政权和法团主义政权等概念时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的价值判断。^②

五 权力差：拉美区域国别知识的战略塑造

知识是权力问题，有权力者的视角占支配地位，知识权力支撑世界政治中的软权力与硬权力。^③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应将“自主”确立为起点，以知识生产驱动，以体系建设为支撑，最终服务于话语体系建设。这不仅涉及理论创新和方法突破，还需要在全球化语境下坚持中国视角和中国立场，凝练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范式和分析框架。利用好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时间差”和“位置差”，最终服务于中国外交大局，发挥中国参与全球学术对话、塑造国际秩序的能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识力量。

（一）知识供需两端的契合与匹配

在知识生产方面，拉美历来有一种依附性。^④在这种依附的模式中，知识供

^① 张森根：《200年拉丁美洲经济盛衰的箴言——读〈独立以来的拉美经济史〉》，载《拉丁美洲研究》，2000年第3期，第59页。

^② 张森根：《阅读多元化视角下的拉丁美洲——中文版〈现代拉丁美洲〉（英文第七版）评介》，载《拉丁美洲研究》，2014年第3期，第70页。

^③ [瑞典]奥萨·维克福什著，汪思涵译：《另类事实：知识及其敌人》，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第58页。

^④ 黄志成著：《当代拉丁美洲教育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70页。

需两端的契合与匹配并不对称。拉美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特性是容易受到各种外来思潮和理论的影响，这些“舶来品”同本地思潮结合，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拉美的发展。经历了“华盛顿共识”对拉美国家的“指导”，越来越多的拉美国家精英和民众对发达国家所谓的专业知识持有的幻想破灭。经济实力 and 知识力量无法画等号，源自发达国家的知识也不一定反映客观实际。^①

区域国别学的战略性已经得到了中国国内学界的共识。相较于美国服务自身霸权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使命在于服务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主张和价值追求。中国的战略安全与战略机遇期联系在一起，中国需要在新时代主动把握“战略时间差”塑造战略机遇。^②在这一背景下，利用好“时间差”打造中国的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有利于通过供给域外地区和国别的知识，助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利用好“位置差”打造中国的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有利于夯实中外共建“一带一路”和命运共同体的文明根基，助力中国在世界舞台依靠和平力量稳步崛起。

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组成和探索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力量，拉美是中国志同道合的同行者、团结合作的引领者、共同利益的捍卫者。中国关于拉美知识的供给和需求应该为中拉关系服务。在基础理论层面，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的性质应该以问题为导向，现代化成为这种理论知识对接的现实需求。事实上，国内较早探讨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系统的学术成果集中在以拉美为对象的考察，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等多学科的学术研究和国外学术成果译介，还有关注巴西、墨西哥、阿根廷、智利等国家现代化道路的专门研究。^③在应用对策层面，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需要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知识生产

① Nancy Birdsall and Francis Fukuyama, “The Post – Washington Consensus: Development after the Crisis”, in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2011, pp. 45 – 53.

② 胡键：《“战略时间差”与中国的战略安全》，载《国际安全研究》，2022 年第 3 期，第 57 – 78 页。

③ [阿根廷] 吉列尔莫·奥唐奈著，王欢、申明民译：《现代化和官僚威权主义：南美政治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年；董国辉著：《阿根廷现代化道路研究——早期现代化的历史考察》，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3 年；董经胜著：《巴西现代化道路研究——1964 – 1985 年军人政权时期的发展》，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9 年；贺喜著：《智利现代化道路研究——1970 – 1973 年阿连德“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北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4 年；吴洪英著：《巴西现代化进程透视——历史与现实》，北京：时事出版社，2001 年；曾昭耀主编：《现代化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拉美经验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年；韩琦主编：《世界现代化历程（拉美卷）》，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 年；曾昭耀著：《政治稳定与现代化——墨西哥政治模式的历史考察》，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年；苏振兴主编：《拉美国家现代化进程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

能力。区域国别学首先具有战略性，自学科创立之初就带有天然的咨政服务基因。^① 其中，区域国别学服务国家战略的关键环节是“知外能力”，即通过系统、全面深入理解中国与拉美国家交往中的主体特征、关系网络和动态过程。一方面，鉴古知今，剖析国际地缘政治经济变局下中拉合作的深层机理；另一方面，知今促今，提供服务于中拉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对话性知识。这是一种功能型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体系，服务科研、服务政府、服务社会应该是有机统一体。^② 过去中国关于拉美的知识生产主要解决中国与拉美国家在国家层面的关系，未来应该是基于拉美国家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生产当地知识，以帮助中国的企业在那里经营，维护中国的海外利益。只有加强对拉美本土知识的理解，才能更好地进行人文交流，真正实现文明互鉴。

（二）知识生产范式的重建与塑造

中国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与美国有着本质区别。相较于美国的全球称霸野心，对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来说，区域国别知识生产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有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并便于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在美国，当前区域国别研究更多是一种智库层面的组织形态，以问题为导向，来自不同学科、不同领域、不同机构的专家和官员型学者组成临时团队进行合作，生产基础理论或应用对策成果。

中国区域国别学作为交叉学科的属性，为传统学科的西方话语“祛魅”提供了机会窗口。在包括拉美研究在内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无论是经济学还是国际关系学出身的研究者，其早期学术训练均会接触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或国际关系理论，在学术研究中存在顺着这些路径推演的情形，这在某种程度上会影响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在当前建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热潮下，过去单一学科背景的国际问题研究者开始自觉地进行学科交叉，在接受交叉学科内其他学科知识的时候可以规避西方固化、单一的研究范式，在交叉学科门类下对知识生产范式进行重建和塑造。

中国区域国别学作为科学化认识世界的工具，为知识生产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创造了条件。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重点议题本身就带有主体通过议程设

^① 王战、刘若云：《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建构若干问题探析》，载《国际关系研究》，2024年第2期，第13页。

^② 杨体荣、翟崑：《构建中国区域国别学功能型知识生产体系》，载《北大区域国别研究》（第7辑），2024年，第26-46页。

置影响客体并实现基于客体知识的政治含义,而且这些议题本身的科学性值得商榷。但是,这种认知鸿沟并非不可跨越,无论是美国的拉美知识还是中国的拉美知识,其身份都不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稳定性和绝对性。在区域国别语境下,中国从“他者”变成“自我”,从被他者话语建构和解释的客体转变为挣脱权力不对等状态、重新掌握能动性的主体。^①此外,相较于美国拉美研究群体中“重大国、轻小国”的偏见,中国和拉美国家的合作是一种平等对话,无论是来自拉美大国还是小国的学者均可以同中国学术界展开对话。^②

(三) 知识生产方式的优化和创新

新兴技术介入知识生产,为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创造了便利。然而,面对 AI 的迅猛发展和快速迭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可能并不擅长,因此需要通过跨大类学科的有组织科研进行突破。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提供了这样一个先行先试区。中国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需要统筹各方面的力量协同推进。美国拉美研究知识生产的驱动力是出于政治需求与学术兴趣的共生,知识被打上政治烙印^③;而中国的拉美研究知识生产可以在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下进行有组织科研,集中力量突破关键问题。

区域国别学作为服务国家战略和对外交往的重要学科,需要加强对历史素材和现实资料的分析。过去,受语言限制,中国学者关于拉美知识的获取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带有严重偏见的二手英文资料或三手中文资料,这些资料文献反映的是美欧的关注点和价值观偏好,无形之中助长了西方关于拉美知识生产的权力。^④当前,新兴技术深刻改变了知识生产的方式。随着 AI 信息抓取、海量数据、多语种语料库等数字基础设施的发展,一道又一道技术门

① 赵斐、姜锋:《试论区域国别学的研究主体与客体》,载《外语电化教学》,2024 年第 4 期,第 4-7 页。

② 例如,复旦大学于 2017 年 5 月牵头组建复旦—拉美大学联盟,立足学术,促进中拉知识分享与理解互信,服务中拉人文交流。联盟中既有来自巴西、阿根廷等同样被美国重视的国家的高校和学术机构,也有来自乌拉圭这样处于美国战略外围国家的学术机构。

③ 梁志:《知识与政治:冷战时期美国的拉丁美洲研究》,载《社会科学战线》,2012 年第 6 期,第 82-87 页;石晓文:《美国拉丁美洲研究的缘起及其底层逻辑》,载《西南科技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 年第 1 期,第 1-6 页。

④ 翟东升:《国际政治经济学与区域国别学的相互促进》,载《世界政治研究》,2023 年第 2 辑,第 19 页。

槛被跨越，借助人工智能技术获取拉美西班牙语、葡萄牙语一手知识的便利度显著提升。未来，基于“外语+”学科基础上的拉美研究将使得对拉美本国语言一手资料的高效加工成为现实，从而实现真实客观的拉美区域国别知识生产。

区域国别学作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需要有创新的研究方法。区域国别学交叉学科的性质决定了其在统一层面形成适用于所有国家、所有区域的研究方法。新时代，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结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中外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实践，在知识生产上自觉地将政治学、国际关系、经济学的理论同中国和拉美国家发展进程中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以提升中国拉美研究的质量。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合作可为区域国别学贡献独创性的新理论、新概念、新体系。当前，国内区域国别学界已经提出了“焦点—场域法”^①“调查研究与因果解释”^②“文野互动”^③等具有可借鉴价值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未来可以结合拉美研究实践，提升拉美研究的学理性和科学性。

区域国别学作为融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为一体的学科，需要二者的互促发展。坚持学科原则的美国学术界对跨学科的区域研究有所忽视，且受“普遍性原则”影响，认为现有社会科学理论和方法普遍适用，忽视了对拉美独特性的研究，使拉美研究的质量和学术地位受到不利影响。^④基于美国拉美研究的这种偏废，中国拉美研究应该以同时服务两类研究为目标。一方面，用拉美国家和中国的互动实践证伪具有西方中心和西方色彩的基础理论。经验的、科学的系统可能被实践反驳，“科学”可以被证伪。^⑤基于时间差和位置差，美西方在关于拉美知识的生产上获得了权力差并利用这种权力差抹黑、污名化中拉合作，“新殖民主义”“新依附论”“新中心—外围”等

① 曾向红：《论区域国别学中的焦点—场域法》，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5期，第48—77页。

② 叶成城：《调查研究与因果解释：区域国别学研究方法刍议》，载《东北亚论坛》，2023年第4期，第113—126页。

③ 高良敏：《文野如何互动：有关区域国别研究知识生产与方法论取向探讨》，载《区域国别学》，2022年第1期，第149—168页。

④ Gláucio Soares, “Latin American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A Critique and a Proposal”, in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Review*, Vol. 11, No. 2, 1976, pp. 51—69.

⑤ [英] 卡尔·波普尔著，查汝强等译：《科学发现的逻辑》，北京：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论调均基于以拉美为考察对象的传统基础理论，已经无法适应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现实。另一方面，用拉美国家和中国的本土理论互鉴，为中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识。中国和拉美都拥有古老的历史文明，推动中国和拉美国家将历史、地理等原因造成的文化隔阂转化为以求同存异、取长补短为目标的文明互鉴，是双方的共同任务。^①

六 余论

社会大变革的时代一定是哲学社会科学大发展的时代。面对全球知识生产的范式重构浪潮，区域国别知识生产可以成为推进中国学术系统性战略布局和深化中外文明互鉴战略要务的一把钥匙。拉美作为“全球南方”的成员，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特殊的战略作用：一方面，作为最早开启现代化实践的发展中国家集中区域，拉美是中国式现代化经验的“反光镜”和“承接地”；另一方面，作为美国“门罗主义”的首当其冲之地和“苦美国霸权久矣”的“被霸凌地”，拉美是中国三大“全球倡议”对接、帮助其获得发展权的全球南方国家先行先试区。

随着区域国别学独立成为一级学科，关于该学科“三大体系”的建设要自觉同建构中国区域国别学自主知识体系相结合。区域国别研究带有与生俱来的“西方中心”特质，缺乏从世界体系中“外围”国家自身视角出发的研究。中国的区域国别学诞生于突破“西方中心主义”和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学理性探索中，突破西方主导的知识生产模式和学科知识生产壁垒，构建自主性、系统性的交叉学科发展新格局，是中国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彼岸”。比较不仅可以产生新的知识，同时也可以优化知识生产方式。本文以美国拉美研究知识生产为参照物，认为中国拉美研究知识生产要利用好“时间差”“位置差”，纠正“权力差”，建立更好地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自主知识体系。

本文所讨论的“时间差”有两层意思：一是中国的拉美研究同美国的拉美研究相比起步晚，具备“赶超”的历史机遇，可以少走弯路；二是中国的拉美研究在知识供给方面落后于中拉关系大发展，存在由实践引领的理论建构

^① 林华：《中拉文明互鉴的“和合”之道》，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 年 12 月 6 日第 6 版。

需求。本文所讨论的“位置差”有两层意思：一是相较于美国的学术殖民，中国的拉美研究具备中拉文明互鉴基础上进行平等学术对话的基础；二是相较于美国对拉美的偏见，中国和拉美国家用平等、互利、创新、开放、惠民的新时代中拉关系诠释了实践引导的客观的知识生产。拉美区域国别知识生产的“时间差”和“位置差”，为中国在知识权力层面打破美国的“权力差”创造了可行空间。但不得不承认，构建区域国别自主知识体系并非易事，需要在理论创新、舆论引导、咨政建言、公共外交、社会服务、人才培养等方面同时发力，既要培养出“领域通”人才，又要培养出“国别通”人才。特别是对于深受美国学术殖民影响的拉美知识和关于拉美研究的知识生产，中国的拉美研究学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最重要也最紧迫的任务是实现直接用拉美国家本土语言与拉美对话，与世界拉美研究学界对话，与不同学科对话，方能更好、更深、更广地参与国际学界拉美研究的知识生产。

（责任编辑 徐 睿）